引文格式：王红,赵玥玥,甘晓静. 长江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J]. 地理空间信息, 2023, 21(11): 81-85. doi:10. 3969/j.issn. 1672-4623.2023.11.019

长江流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

王　红[1,2]，赵玥玥[1*]，甘晓静[1]
（1. 湖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2. 区域开发与环境响应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以长江流域为研究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时间出发，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不同时期流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①流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明朝、清朝最多，先秦次之；不同类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历史时期的数量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先秦、明朝和清朝；②不同历史时期非遗的空间聚集性与其数量关联较大，先秦、明朝和清朝非遗聚集特征显著；③不同历史时期非遗的分布中心主要沿东—西走向，且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

关键词：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特征；空间分布
中图分类号：P208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4623（2023）11-0081-05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WANG Hong[1,2], ZHAO Yueyue[1], GAN Xiaojing[1]
(1.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2.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e,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area, starting from the origin tim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e used the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quant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the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basin are the largest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followed by pre-Qin Dynasty. The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s uneven,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pre-Q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②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re greatly related to its quant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e-Q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significant. ③The distribution cente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re mainly along the east-west trend, and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bas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quantity characteristic, spatial distribution

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表征，保护和弘扬非遗对现代文明建设、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相较于有形文化，非遗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传承人稀缺、传播途径较少、现代碎片文化发展冲击等问题，极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为更好地发掘和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务院制定了由国家级到县级的保护体系，截至2021年先后公布了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非遗具有地区性、民族性和传承性价值，近年来逐渐成为各界学者的研究热点。非遗研究大量聚焦于文化领域，主要为价值评估[1-2]、文化保护[3-4]以及文化与旅游业[5-7]等方面；而非遗极强的地域特征使得相关学者尝试从地理学的角度展开非遗地理特征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类型非遗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不同空间尺度非遗的分布特征等方面。以非遗类型为出发点，殷鼎[8]、陈季君[9]、杨姗姗[10]等分别对体育类、戏曲类、宗教类非遗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基于不同空间尺度，以国家为研究区域，程乾[11]、吴清[12]、徐柏翠[13]等分析了非遗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省级为研究区域，王萍[14]、李蕊蕊[15]、胡娟[16]、田小波[17]、应奎[18]、江娟丽[19]等分别分析了山西省、福建省、湖北省、甘肃省、贵州省、重庆市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

收稿日期：2022-05-26。
项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2171354）。
第一作者简介：王红（1975—），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地图的空间认知及地图文化方面的研究，E-mail：wanghong@hubu.edu.cn。
通信作者：赵玥玥（1999—），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理信息分析及应用，E-mail：zzz167330@163.com。

邓锦山[20]、卢松[21]、吕波[22]等分别对绵阳市、徽州、辽西走廊等小范围非遗进行了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李江敏[23]等探讨了研究区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廖岚钦[24]等从时间角度分析了非遗的类型变化特征；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田磊[25]等研究了流域内非遗的空间分布模式和影响因素；《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系》[26]从历史发展、地域特色等角度对流域内几千年的非遗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其研究重点为非遗的保护和濒危项目的发掘，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起源时间出发，对长江流域非遗的研究较少。长江流域作为我国文明发祥地之一，流域内不同地域文化经扩散、迁移形成的巴蜀文化区、荆楚文化区等，绵延流传了几千年。非遗是流传下来的最接近于人们生活习性的灿烂文化，理清长江流域内非遗的时空分布特征，有助于研究长江流域历史文化，增进对地域文化特色的了解。因此，本文以长江流域为研究区，基于已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非遗的起源时间为出发点，探讨了流域内非遗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播。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地理空间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s://www.webmap.cn）的1∶100万分图幅矢量数据，流域边界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统计流域内非遗的起源时间，由于9项非遗缺少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未能确定其起源时间，因此本文采用的流域内非遗数据为1 044项。

1.2 研究时段划分

根据考古学和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研究[27-28]，将长江流域内非遗的起源时间划分为先秦、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明朝、清朝和民国至今8个时期。本文分析了不同时期的非遗特点，以展现各时期的非遗文化特征。

1.3 研究方法

1）最近邻距离法是表示点对象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可反映非遗点在空间上是呈集聚或随机分布特征。

$$R=\frac{\bar{r}_1}{\bar{r}_E}=2\sqrt{D}\times\bar{r}_1 \tag{1}$$

$$\bar{r}_E=\frac{1}{2\sqrt{n/A}}=\frac{1}{2\sqrt{D}} \tag{2}$$

式中，R为非遗点的最近邻指数，$R>1$呈离散分布，$R=1$呈随机分布，$R<1$呈聚集分布；$\bar{r}_1$为最邻近点间距离的平均值；$\bar{r}_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D为非遗点密度；A为研究区面积；n为流域内非遗点数量。

2）核密度估计法主要通过点要素在其邻域中的密度来显示非遗的空间聚集特征。

$$\hat{f}_h(x)=\frac{1}{n}\sum_{i=1}^{n}K_h(x-x_i)=\frac{1}{nh}\sum_{i=1}^{n}K\left(\frac{x-x_i}{h}\right) \tag{3}$$

式中，n为距离阈值范围内包含的非遗点数量；$K()$为核密度方程；$h>0$为带宽。

3）平均中心法。平均中心用于体现点数据分布的中心点，追踪要素的分布变化，用以表示非遗的时空变化规律。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类别非遗的时间特征分析

基于非遗数据，从不同历史时期出发，分析其数量变化特征（图1），可以看出，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在明朝、清朝数量最多，先秦次之；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整体数量较少，在先秦、秦汉时期和清朝发展较为突出；传统舞蹈、民间文学与民俗在先秦数量最多；传统戏剧、传统医药与曲艺在清朝数量最多，其他时期极少或没有。

1）传统技艺的产生和发展，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息息相关，数量最多。传统技艺在先秦时期主要以服饰和器物制作为主；在明朝以吃食和生活装饰用品为主，包括茶、织造等技艺；在清朝以吃食和各种手工制品为主，如颜料、制扇等。秦汉时期、隋唐五代传统技艺数量较多，民国至今数量较少。

2）传统美术。先秦时期对生活、劳动生产的记录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造就了大量美学艺术，以绘画、剪纸等艺术形式展现。明朝文人与工匠的相互影响促进了传统美术的继承和发展，各种雕刻技艺等项目较多，该时期传统美术类非遗数量最多。清朝雕刻和刺绣占主导地位。秦汉时期和隋唐五代传统美术有一定发展，其余时期数量较少。

3）传统音乐包括歌唱艺术以及各种乐器演奏的音乐旋律。先秦时期儒家礼乐思想的产生，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该时期传统音乐类非遗数量较多。明朝该类非遗数量也较多，器乐、民歌等均有长足发展。清朝的戏剧促进了音乐的发展，

锣鼓、唢呐等器乐演奏音乐较多。传统音乐在秦汉时期、宋元时期和隋唐五代数量较多，魏晋南北朝和民国至今数量较少。

4）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包括竞技体育、武术、杂技等，其中武术数量最多。先秦时期主要为武术和竞技体育，秦汉时期主要为武术和杂技，清朝3种类型均有发展；但各时期总体数量偏少。

5）传统舞蹈。先秦流传下来的传统舞蹈多为少数民族舞种，一方面与少数民族与生俱来的歌舞能力有关，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保存更完整，该时期的舞蹈除了祭祀需要，音乐发展和礼乐教化也是促进舞蹈发展的重要因素。隋唐五代也是少数民族舞蹈占主导；宋元时期传统舞蹈数量仅次于先秦，汉族舞蹈逐步发展；明朝和清朝节日庆典和龙舞的发展促使汉族舞蹈数量增多；其余时期，传统舞蹈数量较少。

6）民间文学包括神话故事、民间传说、说唱文学等。先秦时期主要以神话和传说为主，该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水平高度发达，数量较多；先秦以后各个时期均有发展，其中秦汉时期和宋元时期的数量较多，但总体数量偏少。

7）民俗。先秦时期，民俗主要源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包括节日、婚俗等，一方面其时间跨度长，产生的风俗习惯较多；另一方面其文化中的“礼与俗”关系密切，使得民俗源于社会的各个层面。隋唐五代和宋朝经济发达，佛教和道教迅速发展，从宗教发展出来的庙会应运而兴，其民俗数量较多。各时期数量起伏较大，民国至今无新发展。

8）传统戏剧。戏剧的发展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傩戏和阳戏，秦汉时期到隋唐五代有少数戏剧的产生；宋朝南戏的发展使得戏剧有了完整的文本创作，且城市中的瓦舍勾栏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元朝元曲的形成与发展为明清时期戏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批剧作家创作的剧本是后世戏剧发展的根本；宋元时期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一定条件，但数量不多；明朝戏剧长足发展；清朝戏剧发展达到顶峰，数量最多；民国至今数量较少。

9）传统医药总体数量较少，这是由于医药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传承和发展大多局限于师徒或医药世家，且为保证传承的完备性，需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累积。因此，明朝之前传统医药类非遗数量极少；明朝的中医药有了长足发展；清朝的传统医药数量最多；新中国成立后，西医的引进对中医的冲击较大，医药类非遗数量稀少。

10）曲艺。先秦时期就有鼓盆歌这种表演形式，但直至隋唐五代，曲艺才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发展。宋朝城市中的瓦舍勾栏同样为曲艺提供了演出场所，推进其发展，但宋元时期曲艺数量也极少。明朝开始，曲艺繁荣发展，直至清朝，曲艺类非遗数量最多。民国至今，仅存一项曲艺非遗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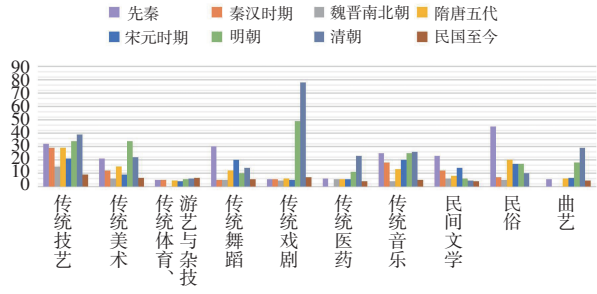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

总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在清朝最多，其次是明朝、先秦、宋元时期、隋唐五代和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偏少，民国至今数量最少。

2.2　不同时期非遗的空间特征分析

2.2.1　空间分布类型分析

基于ArcGIS软件和已有数据，采用最近邻分析方法，统计得到流域内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表1），可以看出，各时期非遗在空间上均呈现聚集分布特征，其中先秦、明朝和清朝的 R 值较小，清朝集聚程度最高；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时期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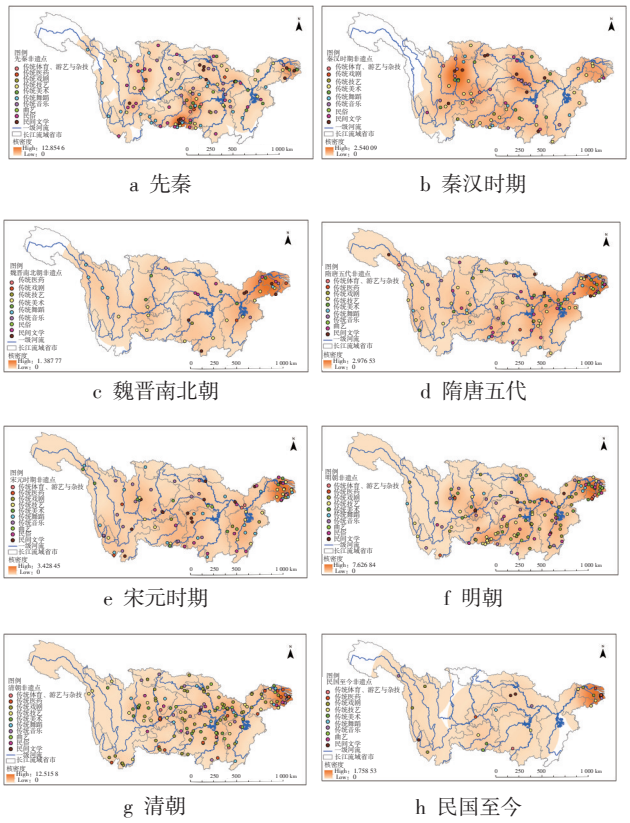
表1　不同历史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

时期	平均最近邻距离/ m	期望最近邻距离/m	R值	P值
先秦	31 070.31	53 533.64	0.580 4	0
秦汉时期	54 471.91	67 087.66	0.811 9	0.000 6
魏晋南北朝	81 367.21	103 190.44	0.788 5	0.007 3
隋唐五代	52 897.99	70 054.29	0.755 1	0
宋元时期	49 493.91	69 297.90	0.714 2	0
明朝	27 105.56	48 293.381	0.561 3	0
清朝	24 442.41	46 342.91	0.527 4	0
民国至今	85 184.68	111 846.84	0.761 6	0.004 9

民国至今的 R 值在0.7~0.85之间，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先秦时期巴蜀文化区、两湖文化区等的产生和文化的扩散使得非遗数量较多；明朝和清朝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明朝商品经济萌芽，长江文化发展进入新高度，清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发展，因此这两个时期的非遗数量庞大。上述分析表明，非遗空间分布的集聚性与各时期的非遗数量有很大关联，数量多的时期聚集分布特征显著。

2.2.2 空间聚集特征分析

为探究不同时期非遗的空间聚集特征，本文采用核密度分析法进行可视化表达（图2），可以看出，先秦时期非遗在贵州省和上海市内分布最密集；秦汉时期非遗在四川省内分布最密集，其次为湖北省和江苏—浙江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非遗在长三角分布最密集；隋唐五代非遗主要聚集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宋元时期非遗密集分布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在四川省和长江中下游几个省少量聚集；明朝非遗在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少量聚集，在上海—江苏—浙江分布最密集；清朝和民国至今时期非遗在上海—江苏—浙江分布较密集。



a 先秦　b 秦汉时期　c 魏晋南北朝　d 隋唐五代　e 宋元时期　f 明朝　g 清朝　h 民国至今

图2 不同历史时期非遗空间分布特征

（审图号：GS(2020)4632）

由此可知，各时期非遗均在上海—浙江—江苏一带呈集聚分布特征，位于长江流域吴越文化区和沪上文化区，一方面由于该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程度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形成并发展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文化和越文化在发展中相互融合、渗透，形成独特的江南地区文化，唐、宋时期文人才子竞相涌现，明清时期吴越文化尤为兴盛，开始向北方渗透，展现了其在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的地位。除此之外，荆湘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云贵文化区等长江上中游地区也是非遗重要的发展区域，其得益于不同地貌形成的风格迥异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多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为长江流域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2.3 非遗平均中心变迁分析

根据非遗在各个时期的空间分布，分析其分布中心的迁移走向（图3），可以看出，非遗平均中心总体由西向东迁移，先秦至秦汉时期向北移动，秦汉时期至魏晋南北朝向东移动，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向西移动，宋元时期至民国至今向东移动；8个时期非遗平均中心均位于湖北、湖南两省内，除先秦和秦汉时期外，其余时期非遗平均中心均位于长江干流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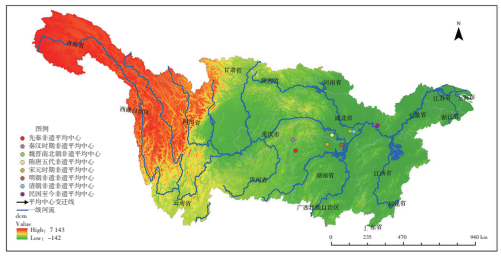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时期非遗平均中心迁移

（审图号：GS(2020)4632）

3 结 语

长江流域孕育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流域内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本文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非遗的起源时间出发，研究了长江流域内非遗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发源于清朝的非遗数量最多，其次是明朝，民国至今数量最少，除传统舞蹈、民间文学、民俗外，其余类别非遗均呈现发源于先秦、明朝和清朝数量较多的特征，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舞蹈、曲艺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随时间呈“两升三降”的变化趋势，传统戏剧在明清独盛，传统医药、传统音乐、民间文学和民俗呈“一升两降”的变化特征；②流域内国家级非遗在8个时期均呈聚集分布特征，其中清朝、明朝和先秦聚集特征最显著，各时期非遗均在上海—浙江—江苏密集分布，在湖南—湖北和贵州—四川等地次密

集分布；③各时期平均中心总体上由西向东迁移，皆位于湖北、湖南两省内。

现今，文化全球化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使得传统文化的发展受到毁灭性打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和完善的传播体系至关重要。长江流域非遗数量庞大，分析流域内非遗的时空分布特点，理清不同时期的数量特征和空间分布模式，深入了解长江流域的文化区域特征，有利于建立非遗的重点发展区域和个别类型非遗的针对性保护区域。在未来研究中，将进一步探讨不同地理要素、地区文化等因素对非遗的影响，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和传承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 Heredia-Carroza J, Martos L P, Aguado L F. How to Meas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alue? The Case of Flamenco in Spain[J].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Arts, 2020(1): 149-170

[2] Ernestina G, Claudia M, Silvia D, et al. 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le to Promote Sustainability in Tour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and Service Sciences, 2013, 5(1):101-114

[3] Muhammad Z I, Norsimaa B M, Syed O S Y.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sing Advance Digital Technology: Issues and Challenges[J]. Harmonia: Journal of Art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2016, 16(1):1-13

[4] Ying L, Peng D.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Protec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Internet Plus” Era[J].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9, 154:20-25

[5] Halder S, Sarda R. Promo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Tourism: Strategy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nake Charmers(India) Through Geoeducation, Geotourism and Geoconserv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heritage and Parks, 2021, 9(2):212-232

[6] Yao D, Zhang K, Wang L, et al. From Religious Belief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Mazu Belief[J]. Sustainability, 2020, 12(10):4 229

[7] Sun C Q, Chen H, Liao R H. Research on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Strategy Choice for Passing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Masters to Apprentices[J]. Sustainability, 2021, 13(9):5 245

[8] 殷鼎，史兵，陈小蓉.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研究:基于GIS空间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11):116-122

[9] 陈季君. 清代西南地区傩戏地理分布及其特征[J]. 地域文化研究，2017(1):66-74

[10] 杨姗姗，蔡银潇. 西北民族走廊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J]. 青海民族研究，2020，31(3):220-228

[11] 程乾，凌素培.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2013，33(10):1 166-1 172

[12] 吴清，李细归，张明. 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J]. 经济地理，2015，35(6):175-183

[13] 徐柏翠，潘竟虎. 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18，38(5):188-196

[14] 王萍，刘敏. 地理要素在传统无形文化传承中的空间印迹: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J]. 地理研究，2020，39(8):1 807-1 821

[15] 李蕊蕊，赵伟，陈静.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6):97-102

[16] 胡娟，陈慕琳，张艺琼，等. 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特征研究[J]. 经济地理，2017，37(10):206-214

[17] 田小波，胡静.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格局及旅游利用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5(6):1 073-1 082

[18] 应奎，李旭东. 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21，44(5):70-79

[19] 江娟丽，杨庆媛，张忠训，等.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格局及旅游开发模式[J]. 经济地理，2019，39(6):205-213

[20] 邓锦山，禹萱，杨青林，等. 绵阳市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J]. 地理空间信息，2020，18(10):46-51

[21] 卢松，王立妹. 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1，30(1):23-31

[22] 吕波，王辉，何悦，等. 辽西走廊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北京测绘，2021，35(7):860-865

[23] 李江敏，赵青青，陈静. 长江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20，40(12):191-198

[24] 廖岚钦，胡娟. 长江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时空特征及演化[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53(5):804-814

[25] 田磊，孙凤芝，张淑娴.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36(5):186-192

[26] 佚名. 长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系[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27] 李学勤，徐吉军. 长江文化史:全2册[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

[28] 刘锋. 北纬绿斑:长江流域的七彩名区[M].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4